

論政治與經學流向對 《四庫全書總目》評騭標準的影響*

許崇德

提 要

歷來《四庫全書總目》多被視為漢學排詆宋學的工具。清高宗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藉漢學家以攻擊宋學家重門戶與結黨之舉措，漢學家亦出於學術上的需要，希望通過指陳宋學的乖謬，從而撥亂反正，並藉著考據訓詁以還經典之原貌。由於政治與學術各有所求，迨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四庫館編修《四庫全書》，便造就了兩者匯流的契機。

本文旨在探討在上述的背景下，政治與學術互動的現象。四庫館臣因應清高宗政治上的需要，在《四庫全書總目》內對於門戶和朋黨加以非毀；另一方面，清高宗也容許四庫館臣出於學術需要，以漢學為評騭學術的標準，由是形成政治與經學揉合的一個新門戶。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漢宋調和、重漢輕宋、漢宋之爭、經學評騭標準

* 本文是補充和發揮筆者於1993年發表於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歷史系系刊《史潮》第13期，〈《四庫全書》中漢宋調和的表現——以經部提要為例〉之論。陳郁夫教授的「寒泉」網站 (<http://libnt.npm.gov.tw/s25/index.htm>)，為檢索《四庫全書總目》的條文提供極大的方便，謹藉此向陳教授致謝。同時亦要感謝文覺謙先生對本文提供意見，香港大學黎淑雯小姐以及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黃堅強先生協助複印部份資料。

一、引言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說：「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並蓄，如渤澥之納衆流，不乖於全書之目」，¹〈經部總敘〉亦說：「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²看似要摒除門戶，調和漢宋。然而，《四庫全書總目》卻常被視爲是漢學的結晶，所以它排詆宋學，亦屬當然。³桐城姚瑩〈惜抱先生行狀〉說：「纂修者（案：指四庫館臣）競尙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掎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案：指姚鼐）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⁴現代學者論《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學之關係時，亦多持與桐城派相類的觀點。例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說「《總目》外表上對於『宋學』似有極尊崇之意者，然其內容實『標榜漢學，排除宋學』也」，⁵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指出「一如《四庫提要》涉及宋學，必菲薄之。」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說「四庫館就是漢學家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⁷即使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也認爲，《四庫全書總目》對「宋學多少含有反對的態度」。⁸則《四庫全書總目》揚漢抑宋幾成定讞，且被視爲漢學攻擊宋學的例據。清高宗厭惡政治上的黨同伐

1 (清)紀昀，〈凡例〉，《四庫全書總目》，頁18-19。

2 (清)紀昀，〈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

3 詳請參閱本文第七節「超然於漢、宋學之上的經學評騭準則」所舉列的例子，以及註10舉列諸篇論著。又，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亦說：「其後奉旨編刻頒行（《四庫全書總目》），乃由紀昀一手修改，……（紀昀）且自名漢學，深惡性理，遂峻詞醜詆，攻擊宋儒，而不肯細讀其書。如謂朱子有意抑劉安世，於《名臣言行錄》不登一字，而不知原書採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條。謂以呂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而不知書中並無呂惠卿。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講學之家，終不引以爲氣類，故慶元黨禁遂削其名，而不知萬里實於孝宗時乞祠不復出，並無因黨禁罷官之事。謂孔平仲不協於程子，講學家百計排詆，終不能滅其著述，而不知朱子實未嘗詆平仲，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談苑跋〉，於其著述，護惜甚至。謂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爲朱子所論罷，蓋以陳亮之誣構，周密《齊東野語》所載甚明，而不知密之所載，與朱子按狀皆不合，其說得之傳聞，無一可信」，《四庫提要辨證（上）》，頁47。

4 (清)姚瑩，〈惜抱先生行狀〉，《中復堂全集·東溟文集》，卷六，總頁數260-261。

5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第十一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223。

6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64。

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0。

8 內藤湖南（案：即內藤虎次郎），《清朝史通論》，第四章「經學」，頁566。

異，四庫館臣在學術立場上偏重漢學，與清高宗反門戶的立場實相齟齬。然則，清高宗為何對四庫館臣的門戶之見視若無睹？⁹至於《四庫全書總目》令人產生「重漢輕宋」印象，是否純粹出於漢、宋門戶之爭，抑或存在其他的因素，則尚待更有系統的探討。¹⁰

筆者認為在乾隆年間，漢學與宋學不單只是一種學術取向，同時也被用作鞏固統治的政治工具。當時的政治流向是趨於君主獨裁。另一方面，清高宗發現已列為官學的程、朱理學存在不少制約君權的成份，曾在不少場合提出反駁。學術流向則以漢學為尚，經學家以考證訓詁為手段，以淨化和還原儒家經典為目的。故此，清高宗藉編纂《四庫全書》之便，通過《四庫全書總目》匯合政治與學術兩股流向，以作為統合學術與政治的工具。

本文藉由《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以反映政治與經學兩股流向對於形成評騭標準的影響，從而說明《四庫全書總目》何以一方面大力反對門戶之見，另一

9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凡例》說：「每進一編（提要），必經（清高宗）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16。此外，從《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收錄的諭旨，可以知道清高宗相當關注各部提要的內容。又，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亦說：「其實在決定各書是否收錄之外，其他編輯體例，亦大體出於高宗之聖斷。」（頁105）；楊晉龍，〈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意義〉一文註2亦說《四庫全書總目》的思想表現無論是四庫館臣的集體意識或當代的學術共識，「均需在乾隆的同意下纔有可能表現，所以表現的依然是乾隆的思想，至少是他不反對的思想」（頁524）。

10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學關係的討論，計有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頁581-588、劉漢屏，〈略論《四庫提要》與四庫分纂稿的異同和清代漢宋學之爭〉，頁40-44、以及業師羅炳綿先生的〈四庫全書編纂重心的轉變〉（頁1133-1136）、以及〈紀昀的學術思想與四庫提要的立場〉（頁1341-1345）兩篇文章。另請參閱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頁146-151、周積明，〈「四庫學」通論〉，頁265-293、林慶彰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侯美珍，〈「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頁77-129、以及陳東輝，〈二十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頁29-38，對於開創「四庫學」學者著述的介紹。

近年觸及《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學關係的討論漸多，計有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頁85-91、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頁55-79、〈《四庫全書總目》與乾嘉「新義理學」〉，頁1-39、以及〈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頁1-18、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分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頁141-170、張晶萍，〈乾嘉學術與「漢學」觀念〉，頁70-76、薛新力，〈清代漢學思潮對《四庫全書總目》之影響〉，頁118、120-121、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頁253-276、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頁83-128，以及〈乾隆皇帝與漢宋之學〉，頁156-192、王達敏，〈論姚鼐與四庫館內漢宋之爭〉，頁86-94、葉高樹，〈乾隆皇帝「稽古右文」的圖書編纂事業〉，頁59-105、以及氏著《清代前期的文化政策》雖然討論的主體在於文化政策，但對此亦有探討。另外，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亦在第五章，以邵晉涵和姚鼐為對象探討《四庫全書》與漢、宋學的關係。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在餘論〈四庫館派與乾嘉考據學〉，也有作專題性討論。

方面對宋學大加鞭撻，對漢學又加以褒揚，以致自桐城派以來便有《四庫全書總目》重漢輕宋的批評。簡而言之，本文是在傳統說法之外，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此一現象，認為《四庫全書總目》不唯尊漢，在評騭漢、宋二學的同時，也反映了四庫館臣站在學術的更高點來審視漢學與宋學的長短得失，並融合政治而自成一個超然於漢、宋學之上的門戶。

二、乾綱獨攬的政治流向

乾隆年間的政治流向是傾向於君主獨裁，清高宗不時對臣下強調朝廷是在他一人乾坤獨斷之下運作，不容臣下分門別戶去左右政治。然而，在乾隆初年黨爭餘風猶厲，¹¹ 滿族軍機大臣鄂爾泰與漢人軍機大臣張廷玉，互有嫌隙，朝中大臣亦各黨其黨，互相攻訐。大抵滿人依附鄂爾泰，漢人依附張廷玉。其後，鄂爾泰卒於乾隆十年（1745），張廷玉亦在乾隆十四年（1749）致仕，但是朋黨之爭仍衣鉢相傳而未得止息。清高宗在張廷玉致仕後說：「大臣等分門別戶，衣鉢相傳，此豈是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綱坐攬，朕臨御至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¹² 在乾隆二十年（1755），清高宗便借胡中藻一案以打壓朋黨，並在諭旨內說：

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為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為揣摩，群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¹³

故此昭榷《嘯亭雜錄》說該案的性質是「上（案：即清高宗）正其罪誅之，蓋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¹⁴

清高宗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癸丑日的諭旨又再重申「我朝聖聖相承，乾綱獨攬，政柄從無旁落。」¹⁵ 又說：

猶記乾隆初年，詔廷臣集思廣益，至再至三，然諸臣章奏，亦不過摭拾

11 黃鴻壽，〈嚴禁朋黨〉，《清史紀事本末》，頁185-189、王鍾翰，〈清代前期的黨爭〉，頁62-67、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頁723-743。

12 《清高宗實錄》，卷三五四，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頁896a。

13 《清高宗實錄》，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日，頁92a。

14 （清）昭榷，〈不喜朋黨〉，《嘯亭雜錄》，卷一，頁20。胡中藻一案始末見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第1輯「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以及賴惠敏，〈論乾隆初期之滿黨與漢黨〉，頁723-743。

15 《清高宗實錄》，卷五七六，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日，頁332a。

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時事之大者，莫過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初未聞一言及之。¹⁶

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刊行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內，清高宗又藉著對唐、宋兩朝黨爭的批語，說明他反對臣下結黨，以及申明結黨引起的禍害。他認為牛李黨爭的核心人物李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¹⁷ 批評北宋新舊黨爭說：「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蕕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¹⁸ 於是提出：「用人為致治大綱，豈宜稍參私意。朝臣黨援之習，為上者方當力為整飭，以挽頹風。若欲平臣下夙怨，曲事調停，尚復成何政體。」¹⁹

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策試貢士時，又再借題發揮，說明他反對門戶與朋黨的旨意：

學術首嚴真偽，士子讀書敦行，處為良士，出為良臣，原不藉文字為標榜。自欺世盜名之徒，託言講學，謬竊虛聲。而明季東林諸人，流而為門戶、為朋黨，甚至莠言亂政，變易是非，實於朝常國體，世教民風，所關甚大。其何以息邪說，距詖行，使行堅言辯者不得逞其私臆，學術純粹，毋誤歧趨，以正人心而端風教歟？²⁰

從《四庫全書總目》內的〈《劉戡山集》提要〉，我們可以看到四庫館臣對於這種流向的呼應：

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東林一派始以務為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子，雜糅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勢猶未已。²¹

由此可見，在乾綱獨攬的政治流向下，大臣結黨和有門戶之見皆被視為莠言亂政，與當時的政治流向相左。

16 《清高宗實錄》，卷五七六，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日，頁333a-b。

17 （清）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頁40，總頁數421a。

18 （清）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頁60，總頁數245a。

19 （清）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頁70，總頁數250a。

20 《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子日，頁91a。

21 《《劉戡山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二，頁1514。

三、走向漢學的學術流向

漢學和宋學被《四庫全書總目》形容為兩個對立的經學流派。清初至乾隆初年的學者的經學研究方法日益偏重漢學，但是大體上仍是漢、宋學並舉，無分軒輊。皮錫瑞《經學歷史》說：「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漢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²²活躍於康、雍兩朝，兼為清高宗帝師的理學家蔡世遠在〈歷代名儒傳序〉中提出漢、宋學對於經學各有貢獻，說：

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傳體之實。……輕漢儒者，以為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為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²³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

近今漢學昌明，遍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惠士奇）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目以為法。²⁴

由此可見吳派的鼻祖根本不嚴漢、宋之分，在學理上推重漢學，實踐上以宋學為宗，錢穆〈清儒學案序〉亦稱惠氏此舉「尊漢尚不詆宋」。²⁵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說明了惠棟欲通過漢學以推求宋學所重的義理，從而避免犯上宋、明儒鑿穿附會經典之弊：

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

22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341。

23 (清)蔡世遠，〈歷代名儒傳序〉，《二希堂文集》，卷一，頁5-6，總頁數651b-652a。

24 (清)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載錢鍾書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卷上，頁187。

25 錢穆，〈清儒學案序〉，頁383。

遠乎先生之教矣。²⁶

至於開皖派經學研究風氣的江永，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指出江氏所著《禮經綱目》是「以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尤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為之廣摭博討」而成。²⁷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說「大抵江氏學風，遠承朱子格物遺教。」²⁸

另一位乾嘉學壇祭酒戴震，章學誠〈書朱陸後篇〉說：「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源，不可易矣。」²⁹ 余英時亦稱戴震「平生學術兼跨義理與考證，然而細察他對這兩門學問的不同態度，可知他內心始終偏向義理。」³⁰

邵晉涵雖然私淑陽明、蕺山、南雷，但亦專治《爾雅》，精研史事，是以任松如說「不可以宋學目之」。³¹ 由章學誠的記述，我們知道邵晉涵對於宋儒的評價甚為公允，並沒有偏袒宋學：

君（案：指邵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箠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³²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指出當時的漢、宋學的淵源甚深：

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³³

經學家在乾隆初年雖然並尊漢、宋，但日漸注重儒家經典的原意，並且有意識地和有規模地展開經學考證的工作，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考訂經籍，與理學家講天理人慾之辨的治學方針截然不同。他們在考訂經籍的過程中，不斷發現自宋

26 (清)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文集》，卷十一，頁168。

27 (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十二，頁178。

2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第八章〈戴東原〉，頁388。

29 (清)章學誠，〈書朱陸篇後〉，《章氏遺書》卷二，頁16。

30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內篇六〈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頁149。

31 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頁14。

32 (清)章學誠，〈邵與桐別傳〉，《章氏遺書》卷十八，史城編，《章學誠遺書》，頁177。

3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第一章〈引論〉，頁1-2。

至明以來的理學家，爲了爭門戶和其他種種理由而任意刪改經典、臆解經義，³⁴甚至援引釋、老之說以強合儒家經典，使經典因此而失去原貌，於是自發地群起而攻之，希望能撥亂反正。方癸如〈與全紹辰〉對於諸儒疑經、質疑之處，說明經典之不明實由宋儒引起：

近又作《經說疑》。經無敢疑也，所疑者，諸儒經說耳。此經說之可疑，于漢十之一，于唐十之二，于宋十之七。蓋前儒說經，解說而已。至宋而說之不足，則論而議，議而辨，往往于無可疑者而疑。即疑之，則遂以身質疑事。小則改張前說，大則顛倒經文。儼若有聖人復起，言提其耳而命之更定者。³⁵

戴震《孟子私淑錄》亦說：

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釋為借階，雖終能覺寤老、釋之非，而受其蔽，習於先入之言，不察者亦不少。³⁶

宋儒改經的真相逐漸經考證而被揭發，³⁷於是社會上一方面出現前述漢、宋並重的言論，另一方面亦有不少批評宋學的言論。例如，黃永年在〈與陳紹洙〉中指出理學家疏於治經之弊：

學者求道，治經為本，以程、朱諸子書為階梯門徑。伯淳泛濫，諸家出入老佛，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洙泗非詩書執禮，無以為教學。近代以來，號為學者，終身結窠，只是宋元以來語錄，異同紛爭，皆在於是。其繁浩如煙海，尋條失枝，逐流迷源。大較置經於不甚治，前明以來，已成結習。³⁸

紀昀《灤陽消夏錄》也說：

34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說：「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已，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也」，頁264；又例如《《詩疑》提要》對宋儒王柏刪改經典作了詳細的分析，該提要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頁137-138。

35 (清)方癸如，〈與全紹辰〉，《集虛齋學古文》，卷四，頁700。

36 (清)戴震，《孟子私淑錄》卷下，張岱年編，《戴震全書》，卷二十九，頁70。

37 清初諸儒對於經典的考證成果，請參閱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事實上，清儒對於經學的歷史發展欠缺一種溫情與敬意，只是站在學術發展的最高點，批評前人的經學研究，指陳其不足，未有體諒前人處身環境與局限。清初指陳宋學之弊尤以毛奇齡的論述最引人注目，《四庫全書總目》說：「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毛）奇齡開其先路。」（《易小帖》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六，頁38。）

38 (清)黃永年，《南莊類稿》，卷五，頁44，總頁數714a。

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³⁹

總括而言，經學家是針對宋學流弊而作出攻擊，並未至於完全抹煞其優點，他們視本身是漢學、宋學的調和者，從實用角度採兩家之長而用之。皮錫瑞《經學歷史》說：

是江（永）、戴（震）、段（玉裁）之學未嘗薄宋儒也。宋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棟）、江、戴、段為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煞。⁴⁰

再就流程度而言，漢學在乾隆初年已開始蓋過宋學。乾隆初年宋學之不振，於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李中孚傳》亦可見一斑：

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王）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為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⁴¹

面對鄂爾泰的問訊，作為理學家王心敬同鄉的進士竟不知有其人，宋學之隆替可想而知。正如王汎森所說，乾嘉學者相信「當儒家經典的原義以及制度器數的原貌被重構後，聖人的理想便可以付諸實行」，⁴²於是紛紛投入漢學研究。余英時對這個學術信念在其《論戴震與章學誠》有以下解說：

乾嘉經學家都接受一個基本假定，即道在六經，而六經則是由古代的語言文字所構成。因此明道必須從研究訓詁開始。……與此相隨而來的還有另一個共同假定，「即漢人去古未遠」，其訓詁較能得六經語言本意。因此許慎《說文解字》和鄭玄的經注成為一時的顯學。⁴³

39 (清) 紀昀，《灤陽消夏錄》卷一，張致中點校，《紀曉嵐文集》，第2冊，頁10。

40 (清)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313。

41 (清) 江藩，《李中孚傳》，《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載錢鍾書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191。

42 王汎森，《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頁16。

43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內篇八〈補論：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頁185。

周予同〈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提出另一個觀察漢、宋學消長的角度，說：

這些（乾嘉）學者都是科舉出身，熟讀「四子書」，他們在「漢學」方面雖有專長，但對於清政府崇奉的「宋學」，也經涉獵，而他們的專攻「漢學」，又每在考試「及第」以後。⁴⁴

為甚麼乾嘉學者在取得功名以後就摒棄宋學而改投漢學研究？大抵是因為宋學已淪為取得科舉功名的工具之故。國家為了維持取士標準的穩定以及方便考核，於是定下考試內容與範圍和指定的研習書目，由是經學的註釋各有定本。利祿之途既開，理學的研究路向和發展空間勢必受到局限。姚鼐〈復蔣松如書〉便指出了這個現象的由來，說：

元、明以來，皆以其學（案：程、朱之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為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⁴⁵

於是，有識之士為矯時文之陋而棄虛崇實，促成學術風氣的轉變。故此，姚鼐〈復蔣松如書〉說：

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為至，以攻駁程、朱為能。⁴⁶

皮錫瑞《經學歷史》：

經學之所以衰而復盛者，一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閻若璩謂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

44 周予同，〈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頁701。

45 （清）姚鼐，〈復蔣松如書〉，《惜抱軒文集》，卷六，頁13a。四庫館臣對此一現象也有指意，〈《三魚堂四書大全》提要〉中指陳宋學與科舉掛鉤後的不良影響，說：「初，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四書大全》，陰據倪士毅舊本，潦草成書。而又不善於剽竊，龐雜割裂，痕蹟顯然。雖有明二百餘年懸為功令，然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書專為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頁314。）〈四書類 二〉的案語則解釋收錄胡廣《四書大全》旨在示戒而不在示法：「《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註》，積平生之力為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註，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經疑並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四書類 二〉案語，《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頁307）。

46 （清）姚鼐，〈復蔣松如書〉，《惜抱軒文集》，卷六，頁13a。

一時之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幡然一變。……考訂校勘，愈推愈密。⁴⁷

乾隆中葉以後，由於清高宗提倡經學的政策逐漸收效，加上學術研究的累積與職業化等因素的配合下，⁴⁸於是學風更加偏重於漢學，但是漢、宋兩學對立的表面化要到編纂《四庫全書》之後才出現。⁴⁹

四、促成政治與學術匯流的原因

宋學與乾隆中葉的政治與經學的流向相背，政治與學術兩股流向在各有所求的背景下，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文化工程而匯流。

先就政治流向而言，理學家約束君權的主張，與當時君主獨裁的政治流向背道而馳。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指出宋代儒家士大夫在「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下，要求分享治權的要求。例如，程頤曾說：「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⁵⁰而朱熹〈與留丞相書〉對朋黨也作出正面評價：

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

47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299。

48 清高宗提倡經學的政策，請參閱本文第五節「政治與經學匯流的經過」；至於考證學的興起與成為職業的討論，請參閱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以及羅炳綿老師〈清代考證學淵源和發展之社會史的觀察〉，頁75-93等論著。

49 雖然《四庫全書總目》在論述經學發展和評薦經學時皆以漢、宋學為主軸，但是漢學與宋學對立的表面化，卻是在乾隆以後才出現。江藩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以及道光二年(1823)分刊行了《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宋學淵源記》，其揚漢抑宋之論引起方東樹在道光六年(1826)刊行《漢學商兌》以作回應，漢學與宋學之爭由是表面化。清代漢、宋之爭的討論甚為熱烈，如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頁581-588、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頁151-172、王家儉，〈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頁61-85、王汎森，〈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頁3-26、朱維錚，〈中國經學的近代行程〉和〈漢學與反宋學〉，兩文俱載氏著《中國經學史十講》、以及張麗珠，〈「漢宋之爭」難以調和的根本歧見〉，頁235-280、林慶彰、張壽安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等。

50 (宋)程頤，〈論經筵第三劄子〉，《二程文集·伊川文集(二)》，卷七，頁7，總頁數653b。清高宗在〈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對於程頤「天下治亂繫宰相」之說加以駁斥，說：「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之，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反映了清高宗不認同這些威脅君權的言論。引文見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九，頁8，總頁數55a。

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⁵¹

余英時說：「朱熹在『黨』的問題上天曾發出石破天驚之論：『君子』不但應該有『黨』，而且『惟恐其黨之不眾』，⁵²並指出朱熹「一方面運用上古『道統』的示範作用以約束後世的『驕君』，另一方面則憑藉孔子以下『道學』的精神權威以提高士大夫的政治地位。」⁵³這些不利君權的說法隨著程、朱學派的流行而根養於官方認可的儒家學說體系之內。

另一方面，理學家所秉持的三綱五常倫理觀，有助於建立長幼尊卑的差序格局。⁵⁴朱子說：「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⁵⁵亦說：「君臣父子，定位不移，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⁵⁶又說：「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⁵⁷這些強調忠君愛國的學說有助於維持政治和社會倫常穩定，因此，理學亦成爲了統治者保有天下的利器。清聖祖深明理學具有這些政治功能，並加以利用。⁵⁸清高宗延續了清聖

51 (宋)朱熹，〈與留丞相書〉，陳俊文校編，《朱子文集》，卷二十八，頁1079-1080。

52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緒說〉，頁32。

53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二章〈道學、道統與「政治文化」〉，頁60。

54 理學的形成與影響，請參閱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頁249-282。至於宋明理學的一些重要觀念的解說，則請參閱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清代學術觀念的解說，請參閱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頁405-486。

55 (宋)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一〉，《朱子文集》，卷十四，頁435。

56 (宋)朱熹，〈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朱子文集》，卷十四，頁445。

5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二十四，頁598。

58 清代自康熙朝開始，便藉舉隆理學的地位以鞏固政權，例如提升孔廟的祭祀儀式，君主並親身晉謁孔廟，又頒行《朱子全書》和《四書章句集注》，科舉亦以朱子注疏為準，藉此表現文化傳承的道統與皇權的治統相結合。清聖祖說「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日講四書解義》序)，《清聖祖實錄》，卷七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庚戌日，頁899a)。正如葉高樹所說，清聖祖「藉由儒家學術的支持，使統治者搖身一變而為『道統』的守護神」，以「化解漢族知識分子對滿洲統治階層的種族歧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四章〈杜遏邪言以正人心〉，頁188。)另請參閱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型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頁87-124；以及杜維明，〈早期清代思想中「學」的觀念〉，頁119-142，關於治統與道統方面的討論。

祖獎崇理學的政治方針，在乾隆五年（1740），頒諭表明「治統」原於「道統」，⁵⁹ 又曾說理學家周、程、張、朱子「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俾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⁶⁰ 於是儒學成為了一把雙面刃，一方面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支撐點，另一方面又制約了君權。重視君權行使的清高宗又怎樣才可以做到乾坤獨斷呢？

再者，觸動清高宗神經的，除了理學家倡言結黨以及與君主共天下等舉措外，還有南宋理學家們因應當時國勢，於解說《春秋》時發揮民族大義，以強調華夷之辨的著述。《四庫全書總目》說，「說《春秋》者莫黜於兩宋」。⁶¹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概括宋代經學研究的概況說：

宋人之治經學，談義理者則言易，論政治者則說春秋大義。統宋史藝文志計之，宋人所著經部書，春秋類最多，居首位，易類次之。宋人著述固不能盡載於宋史藝文志，而考之史傳，證之典籍，謂宋人春秋之學最為發達，誠非誇大。⁶²

又說：

北宋治春秋者好論內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論禦侮，其言多為當時而發。⁶³

正如吳哲夫〈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所說：「在四庫各部類圖書當中，以春秋類之圖書內容，最堪清室顧忌。」⁶⁴ 舉例而言之，對於後世《春秋》學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胡安國在他的著作中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胡安國《春秋傳》提要〉說：「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⁶⁵ 華夷之辨的觀念貫穿南宋春秋學，並成為主流。

59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日，頁876a。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型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分析了當中的利害得失，說：「由於統治者匯聚「治統」與「道統」於一身，以往二者在意識型態上的區別也就變得模糊不清了。所以這些儒生固然獲得皇帝鼎力的支持，藉以實現文化的理想，無意中卻犧牲了「道統」的自主性。換句話說，傳統裡「道統」批判政治權威的超越立足點被解除了」（頁93-94）。

60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日，頁876a。

61 〈《日講春秋解義》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頁234。

62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注史齋叢稿》，頁140。

63 同上註，頁141。

64 吳哲夫，〈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頁9。

65 〈胡安國《春秋傳》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頁219。

宋儒藉《春秋》以彰華夷之辨的言論，無疑會削弱清政權的合法性和認受性。

尤有甚者，程、朱這些對君權構成威脅的言論已隨著程、朱學說成爲官學而受到保護，清高宗不能說它們是異端邪說而禁止流傳。此外，不少程、朱學派的學者正如清高宗本人所說，「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⁶⁶然則怎樣才可以淨化程、朱理學的「不良」成份，做到「尊者其名，排者其實」，⁶⁷對於清高宗而言，實爲一大難題。

學術流向傾向於以漢學爲時尚的因素，已見前說。當士人十年寒窗苦讀，對宋學認識日深，日益對宋學因了解而失望，甚至反感。因爲士人一旦擠身政壇，可以行使權力以及面對因權力而產生的物質誘惑時，便會發現宋學所講的天理人慾、安貧樂道的道德實踐，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故此有不少理學家在參政以後每每表裡不一。康熙至乾隆年間有不少理學名臣是言行不符，使理學家無論在政治、學術和社會方面的地位日降，促成宋學的邊緣化。清聖祖曾因理學家言行不一而慨嘆說：

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辯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脗合，此即真理學也。⁶⁸

又曾說：

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漢官內有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⁶⁹

清聖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四月壬辰日發出的諭旨當中，對理學家的失望可謂溢於言表：

諭大學士等翰林官，以文章爲職業，今人好講理學者輒謂文章非關急務。宋之周、程、張、朱，何嘗無文章，其言如是，其行亦如是。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顧，朕必嘉之，即天下萬世亦皆心服之矣。傳諭翰林

66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日，頁876b。

67 此乃套用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的論斷（頁581-588）。

68 《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日，頁157b-158a。

69 《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五，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丁巳日，頁202b-203a。

官知之。⁷⁰

以康熙朝的理學名臣李光地為例，全祖望〈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說：「榕村大節，為當時所共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⁷¹

即使是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亦不例外，他既倡言安貧樂道，又以殖財為事，最終在乾隆四年（1739）因營私被革職。清高宗說他「在九卿班內，假公濟私，黨同伐異，其不安靜之痼習，到老不改，眾所共知。」⁷²

甚至清高宗本人亦斥責臣工為「假道學」，至使理學家淪為負面形象的代表：

楚省吏治，不意竟廢弛至此。汝（案：指湖廣總督阿爾賽）其實力整飭，不可復前人之空言無補也。至湖北巡撫晏斯盛，其人乃一假道學者流，而其中不能無他。卿其不可為彼所欺，不過藉其材具，令辦事可耳。⁷³

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就尹嘉銓案而發的諭旨說，「從祀宮牆，非人品學問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朝從祀寥寥，寧缺無濫」，又一一指出理學名臣之短處，例如湯斌「在皇祖（案：即清聖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能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傅之義有虧」；又例如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齎送蠟丸告變，外間傳有不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孚。」⁷⁴再加上經學在科舉考試的成份日重，以及君主大力提倡下，宋學逐漸失去了對士人的吸引力。昭槤《嘯亭雜錄》說：「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雖江浙文士之藪，其仕朝者無一人以理學著。」⁷⁵乾隆

70 《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九，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日，頁745b。

71 （清）全祖望，〈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頁16，總頁數215a。

72 《清高宗實錄》，卷九十二，乾隆四年五月戊午日，頁416b。

73 《清高宗實錄》，卷一八九，乾隆八年四月，頁440b。又，早在乾隆六年（1741），清高宗已在諭旨中指出理學大臣德沛的陰暗面，稱他「托理學之名，而待人行事，多用權術」，《清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日，頁1166a。理學大臣尹嘉銓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供詞當中亦以「假道學」自況，又自責「欺世盜名」，事見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第6輯「尹嘉銓為父請謚並從祀文廟案」，頁606-607，可見「假道學」一詞的負面性以及其流行程度。

74 《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辛卯日，頁57b-58a。

75 （清）昭槤，〈滿洲二理學之士〉，《嘯亭雜錄》，卷十，頁318。

三十二年（1767），程晉芳〈與梅二如書〉形容當時的學術界是「今海宇熙熙，無可擬議，獨理學之緒不甚振」，⁷⁶或有誇大之嫌，但是士人不推宋學的情況可想而知。

五、政治與經學匯流的經過

隨著清初君主漢化程度日深，他們對於經學內不利統治的成份亦了解日深。清聖祖開始局部淨化經學內容，但亦只是集中於淨化一些較為明顯的內容。《日講解春秋解義》便是因為胡安國《春秋傳》「持論過激，抉隱太嚴」，而持論過激其實是指在「華夷之辨」方面的內容，於是編纂此書以「去其（案：指胡安國）論之太甚者」；⁷⁷《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亦「於（胡）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擷其精粹」，⁷⁸尙未觸及淨化程、朱學說不利君主獨裁的部份。

到了乾隆年間，清高宗發現理學還有其他不利統治的成份，於是逐漸調整經學在科舉取士時的比重，藉此降低程、朱學說在科舉考試中對士人的影響。⁷⁹清高宗對於理學和經學的態度可以說是從實用角度出發，通過兩者的競爭與融合，從而達至最有裨於治道的效果。⁸⁰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亦說：

乾隆帝標榜向用儒術，但前期重用的漢大臣仍然多為李光地的門生故吏，提倡所謂「正學」；其後開四庫館，也鼓勵「樸學」，還默許紀昀等人譏評「假道學」，但文官考試中所用的經典詮釋，依然是李光地、方苞等主編的甚麼「折中」、「義疏」之類。所謂樸學，在統治者眼裡，是「學」非「術」，可以用來點綴「文治」，卻不足以替代作為治心之術的「正學」。⁸¹

由以下事例可以看到清高宗一方面保留理學作為官方認可的指導思想，另一

76（清）程晉芳，〈與梅二如書〉，《勉行堂文集》，卷三，頁15，總頁數325b。

77（清）清聖祖，〈《日講春秋解義》序〉，故宮博物院編，《清聖祖御製詩文二集》，卷三十一，頁5，總頁數106b。

78〈《春秋傳》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頁219-220。

79黃順益，《惠棟、戴震與乾嘉學術研究》，說：「乾隆此一文化政策的改變，不但使政府官吏的成員進行一番更新，也造就了乾嘉一代的學風」，頁57。

80錢穆亦說：「滿清最為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自序〉，頁18。

81朱維錚，〈漢學與反漢學〉，《中國經學史十講》，頁138。

方面又鼓勵和壯大經學，以抗衡理學對於政治的負面影響力。

清高宗在乾隆元年（1736）即位之初，便頒諭強調經學的重要性，說「從來經學盛，則人才多。人才多，則俗化茂。稽諸史冊，成效昭然。」⁸² 在乾隆三年（1738），清高宗頒諭敦促士子留心經學之餘，並強調「學問必有根柢，方為實學」：

士人以品行為先，學問以經義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國家之取士也，黜浮華而崇實學。……至於學問必有根柢，方為實學。治一經必深一經之蘊，以此發為文辭，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簡，祇記誦陳腐時文百餘篇，以為弋取科名之具，則士之學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至於書藝之外，（各省學臣）當令（士子）究心經學，以為明道經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俾士子不徒視為具文者，在學政酌量行之，務期有益於膠庠，各省亦不必一轍。⁸³

清高宗在乾隆四年（1739）准陝西學政嵩壽奏，提倡童生習經學，又准山東學政徐鐸所奏，以「通經致用」獎掖學子。⁸⁴

清高宗在乾隆五年（1740）訓令諸臣精研理學，⁸⁵ 但在諭旨當中提到考據與理學是互為補足，同時表示厭惡由講學而引起的門戶之見：

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偽託者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朕願諸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闡奧，涵泳從容，優游漸漬，知為灼知，得為實得。⁸⁶

82 《清高宗實錄》，卷十七，乾隆元年四月辛卯日，頁448a。

83 《清高宗實錄》，卷七十九，乾隆三年十月辛丑日，頁243b-244a。

84 《清高宗實錄》，卷八十八，乾隆四年三月丁未日、己酉日，頁362a、頁363b-364a。

85 據牟潤孫，〈論弘曆的理學統治與錢大昕〉一文所論，清高宗此舉是因為「進講諸臣」沒有人講理學之故，《海遺雜著》，頁198，說明了在乾隆初年已出現理學不振的徵象。

86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日，頁876a-b。

另一方面，清高宗通過以文字獄作為操控工具，使「道統」不僅要依附於「治統」，連帶其掌控的經學解釋權亦轉移至「治統」手上。在乾隆六年（1741），清高宗指斥謝濟世所註經書詆毀程、朱，下令孫嘉淦查明銷毀其書：

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即當，即云當矣，試問於己之身心又有何益哉？況我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為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為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為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⁸⁷

清高宗的批示說明了批評程、朱學說之權柄在於君主，道統也須附庸治統。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陳安兆在所著的《大學疑思辨斷》和《中庸理事斷》兩書當中「敢評駁朱注，更多尊崇謝濟世之語」，但是清高宗卻認為陳氏的著作「雖不無違背朱注，支離荒謬，要不過村學究識解膚淺，妄矜著作」，於是下旨「此案無容再行辦理」。⁸⁸ 處理文字獄寬緊不一的標準，以及文字獄對於民間學者心理與生命的威脅，遂使經學的解釋權落入君主手中。

清高宗在乾隆九年（1744），採納編修楊開鼎建議，取士時經義與《四書》並重：

請飭國子監及各州府縣學，時時以經學造士。學臣考校生童，亦務以經義與《四書》文並重。查六經為載道之書，國家設科取士，自州縣試以至鄉會，近奉諭旨，訓飭考官不得專重《四書》文而忽經義。請再行通飭考校各官，如《四書》文雖佳，而經義影響游移者，概置不錄。士子自必勉強學問，經義日明。⁸⁹

87 《清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日，頁1165b-1166a；謝濟世一案始末，見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第1輯「謝濟世刊刻所註經書案」；另一例子為乾隆二十一年（1756），朱思藻編集《四書》成語而被流放黑龍江，見《清高宗實錄》，卷五零五，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丁亥日，頁368a-b。

88 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第2輯「陳安兆著書案」，頁131、134。

89 《清高宗實錄》，卷二二二，乾隆九年八月丁未日，頁862b。

翌年（1745），清高宗在策試貢士的試題中指出：「政事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乃一致」，又說：「將欲為良臣，捨窮經無他術。」⁹⁰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指出此等舉措有助於更多的漢學家走入政壇。⁹¹

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藉刊行《十三經注疏》，在序言當中提出「篤志研經，敦崇實學」的號召。⁹²

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在策試貢士的試題中特別提出不可「事詞章而略經術」：

多士修之於家，宜有明治體，知治要，以期自見於當世者。而事詞章而略經術，急進取而競聲華，論文體則尚浮辭而乖實義，於聖賢道德之實，未能體之於心，修之於行事者，將教化之未明與？⁹³

在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己酉日的諭旨，清高宗開始調整崇理學以治國的方針，對於經學作出獎掖，令大臣薦舉「潛心經學者」：

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其枝葉也。……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為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勿濫，稱朕意焉。⁹⁴

在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藉策試以宣示窮經的重要性，說：

經術昌明，無過今日。第考之於古、議大政、斷大獄、決大疑，輒引經而折其衷，此窮經之實用也。今欲矯口耳之虛文，以致實用，其要安在？⁹⁵

90 《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九，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日，頁82a。

91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說：「從乾隆十年開始，我們發現科舉考試專以經史為試題了，這也是日後有很多經史研究有成的漢學家進入政壇的原因」，頁218。

92 《清高宗實錄》，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日，頁729a。

93 《清高宗實錄》，卷三一三，乾隆十三年四月己卯日，頁138b。

94 《清高宗實錄》，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日，頁860a-b。

95 《清高宗實錄》，卷三八八，乾隆十六年五月丙午日，頁97b。

並於同月頒諭旨重申在乾隆十四年（1749）命大臣薦舉潛心經學者，旨在「尚經學，求真才」。⁹⁶在清高宗的提倡下，經學逐漸盛行，出現了昭槅《嘯亭雜錄》所形容的情況：

上（清高宗）初即位時，一時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輦至都下，課其學之醇疵。特拜顧棟高為祭酒，陳祖范、吳鼎等皆授司業，又特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啟運等裒集《三禮》。故一時耆儒夙學，布列朝班，而漢學始大著，齷齪之儒，自踉足而退矣。⁹⁷

另一方面，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清高宗對於程、朱的經學見解表示異議的記載日多，根據陳祖武的統計，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乾隆六十年（1795）間的三十二次經筵講學當中，清高宗質疑朱子之說達十七次之多（即是在過半數的經筵講學當中，清高宗都有質疑朱子之說）。⁹⁸他在〈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評擊程頤「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之說，認為此說甚不可取：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之，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⁹⁹

清高宗不認同程子威脅君權的言論，尤其深殖臣心，並且在提要之內反映出來。〈《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提要〉：

我皇上御跋程頤經筵劄子，力斥其天下安危繫於宰相之說。誠所謂聰聽彝訓，垂裕後昆者矣。¹⁰⁰

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再藉尹嘉銓案申明他反對程子這個論點，說：

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亂繫宰相，此祇可就彼時朝政闕冗者而言。若以國家

96 《清高宗實錄》，卷三九一，乾隆十六年五月辛巳日，頁132a-b。

97 （清）昭槅，〈重經學〉，《嘯亭雜錄》，卷一，頁15-16。

98 陳祖武，〈從經筵講論看乾隆時期的朱子學〉，頁299-300。

99 《清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九，頁8，總頁數55a。有關清高宗批評宋明理學家的討論，請參考陳祖武，〈從經筵講論看乾隆時期的朱子學〉，頁295-313；以及王達敏，〈從尊宋到崇漢——論姚鼐建立桐城派時清廷學術宗尚的潛移〉，頁279-293等論著。

100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五，頁494。

治亂專倚宰相，則為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之，使為人君者深居高處，以為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朕以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¹⁰¹

若果將上述清高宗與四庫館臣的言論，與清高宗在乾隆六年（1741），指斥謝濟世所註經書詆毀程、朱案的言論比而觀之，則可以知道清高宗對於宋學態度的轉變，也說明了宋學在滿清君主眼中只是一件統治工具，對於宋學的褒揚只是出於政治需要，而非出於對學術的熱忱：

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即當，即云當矣，試問於己之身心又有何益哉？況我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為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為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為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¹⁰²

此外，這亦反映了是非公理、經學解釋權已為君主所操持，宋學在官方的地位也見動搖。

在提升經學在考取功名的重要性的同時，清高宗亦對不利統治的儒家經典進行修訂。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便刊行《御纂春秋直解》，以消解理學家藉《春秋》經以明華夷之辨的影響。清高宗在序中稱胡安國之春秋學「傳會臆斷，往往不免」，又稱編纂《御纂春秋直解》「意在息諸說之紛歧以翼傳，融諸傳之異同以尊經」。同時又提及治經當求直解，不可曲說離經：

蓋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案：指《御纂春秋直解》）

101 《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日，頁86a-b。

102 《清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日，頁1165b-1166a。錢穆，亦說：「清代雖外面推尊朱子，但對程朱學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則極端排斥。……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的程朱招牌，他們絕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又說：「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是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了解之故」，《國史大綱（修訂本）》，頁657。

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¹⁰³

所謂的「曲說離經」正正是宋學末流的缺點，反映了清高宗對於漢學經傳並業的重視，亦說明了官方欲通過刊行認可的經典以統一經書內容的詮釋，不容臣民以己意解說經典。清高宗便是藉編纂《四庫全書》，利用以漢學為尚的學術流向以降低理學對政治和學術影響力，再配合其他政策，堂而皇之將宋明理學中不利統治的影響消融於無形。

然而，官方單憑政策是不足以壯大漢學以抗衡宋學，需要得到學術界的支持與配合才可成事。適逢當時學術流向由漢、宋並重轉向以漢學為尚，但這種學術流向尚未得到官方正式確認和支持，於是在各有所需的背景下，乃產生了兩者合流的有利條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高宗下詔編纂《四庫全書》，造就了學術與政治合流的契機。清高宗在諭旨當中，一方面表示要蒐集「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之書，¹⁰⁴ 另一方面，他在翌年（1773）又明白宣示「方今彙輯《四庫全書》，典籍大備，訂偽衷是之作，正當其時。」¹⁰⁵ 若將此舉與他在經筵講學中質疑程子、朱子之說（詳下文）合而觀之，則可明白清高宗當其時並不認同理學所傳為儒家正統，亦反映了他希望通過彙輯《四庫全書》來整理儒家經典，從而整理出切合聖人原意的經典。由於「訂偽衷是」需要通過訓詁考證才可以達到，漢學的地位由是得到官方的認可，研究漢學也因此而成為經學家的衣食之業。章學誠〈與錢獻之書〉：

至四庫館開，校讎即為衣食之業，一時所謂《爾雅》、《三蒼》、《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書，哀然盈几案間，而中才子弟，亦往往能摘詔諂商商之誤，則愈盛矣。¹⁰⁶

¹⁰³ 《清高宗實錄》，卷五六八，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丁卯日，頁211b-212a。

¹⁰⁴ 《清高宗實錄》，卷九零零，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日，頁5a。

¹⁰⁵ 〈諭內閣著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頁129。

¹⁰⁶ （清）章學誠，〈與錢獻之書〉，《章氏遺書·佚篇》，頁695。又，羅檢秋說：「乾隆三十八年開館修《四庫全書》，網羅專門學者300多人，更是把崇尚博學、實學的風氣推至高潮。編纂《四庫全書》需要從事大量甄別文獻、校勘版本以及考證源流的工作，這都是考據學的基礎訓練。」《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頁37；其他事例請參閱羅炳綿老師，〈清代考證學淵源和發展之社會史的觀察〉，頁75-93。

漢學被清高宗用以抗衡理學，除了因為當時學風尚實學，言之有據所促使之外，漢儒重師說，可以說是信奉權威；宋儒輒以己見解經，可以說是獨立思考。但從當政者角度而言，信奉權威的士大夫比起獨立思考的士大夫自然較易駕馭。從經學家的角度看，宋學產生的流弊亦較漢學為大，是以〈《孝經問》提要〉說：「漢儒說經以師傅，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傅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¹⁰⁷由是觀之，學術與政治對於漢、宋學評價趨於一致。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紀昀等人在提要內貶抑的是宋學末流悠談無根、任意改動經典和爭門戶等弊端，他們並沒有反對程、朱學說忠君愛國之說，¹⁰⁸如果能夠藉漢學消除理學家結黨的立論基礎，則反有羽翼清高宗行君主獨裁之效。在開四庫館以後，上自帝王，下至經學家的行動更趨於一致，皆以打擊宋學精神為目標，¹⁰⁹《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由是成為清高宗對宋學「尊者其名，排者其實」的工具，君主借經學家去攻擊理學家門戶之爭的故習，又形成了一種反宋學門戶的風尚。姚瑩〈復黃又園書〉亦不得不慨嘆「自四庫館啓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至有稱誦宋、元、明以來儒者，則相與誹笑。」¹¹⁰

至於清高宗和四庫館臣在揚漢抑宋的理念上合若符契此一現象，可取資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提出的聚焦點（Focal point）理論來解構箇中的關係。¹¹¹簡而言之，清高宗就尊漢卑宋的編修方針，雖無明訓，然窺其言行，懿旨超然；而四庫館臣之於漢、宋高下，固自有一家之見，亦有學理所不可爭者；然欲匡正學風，成就一代大典，又非個人之所能及。開四庫館編纂《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便成為雙方一致行動的共同標誌，亦即是雙方的聚焦點。清高宗和四庫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期間，兩者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期待（打擊宋學精神），這種微妙的心理狀況令雙方即使沒有就如何達至共同期待

107 〈《孝經問》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頁266。

108 例如〈《杜詩攷》提要〉說：「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頁1281，反映了四庫館臣認同程、朱等理學家講忠君愛國方面的觀點。

109 誠如錢穆所說，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頁7。革新政令與書院講學是清高宗所欲根滅的部份，而創通經義則是當時經學家所欲糾正的部份。

110（清）姚瑩，〈復黃又園書〉，《中復堂全集·東溪文外集》，卷一，總頁數1045-1046。

而作具體的溝通，但最終也能達至共同期待的結果。故此，在開四庫館之後，雙方的行動已可以用「不謀而合」去形容。以下藉《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說明兩者的期待如何匯流於其中，以及對評騭標準的影響。

六、政治主導的評騭準則

學術爲了與政治妥協，所以對於抱有門戶之見和聚衆講學的理學風尚加以攻擊。錢穆《國史大綱》說：「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漫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爲奉迎。」¹¹²故此，四庫館臣在〈凡例〉說：「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并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齟齬相尋，操戈不已。名爲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¹¹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說法是貫穿於四部而不是局限於經部。

依四庫館臣之見，門戶之別形成於經典解釋權的開放。由於對經典的詮釋有分歧，門戶派別由是而生，最終只會妨害學術，同時亦會禍及社稷。四庫館臣認爲糾正之道在於「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¹¹⁴〈子部·儒家類案語〉指出自春秋戰國以來，學術已有分門立戶的端倪，說：「『八儒』、『三墨』見於《荀子》，〈非十二子〉亦見於《荀子》，是儒術構爭之始矣。」¹¹⁵〈經部·春秋類一小序〉指出即使一經亦有分門戶的情況存在，說：「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¹¹⁶及至宋代，由於語錄的流行，於是門戶之見由是加劇，而這種門戶之見，實爲宋學的程、朱學派開啓其端。〈《伊雒淵源錄》提要〉：

宋朱子撰。書成於乾道癸巳，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

111 見Schelling, Thomas C.,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尤其是第三和四章。謝林對於聚焦點的解釋是：人們通常只會在知道別人將會作出與自己相同的行為時，才會產生一致的企圖與期待。……也許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會出現合作的契機，一個聚焦點使雙方預期對方對自己行動的期望，從而達成某種默契。……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於雙方皆認爲此乃他們所要尋求的解決方案——這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雙方的想像而非邏輯思維，或許是依據雙方對相似事物的類比經驗、先例、偶然性安排、對稱性、美學或者幾何配置、詭辯推理，以及當事人的身份和對彼此的認識（頁57）。

112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頁657。

113（清）紀昀，〈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18。

114（清）紀昀，〈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至於如何達至這個目的，請參閱本文下一節「超然於漢、宋學之上的經學評騭準則」。

115（清）紀昀，〈子部·儒家類四案語〉，《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四，頁799。

116（清）紀昀，〈經部·春秋類一小序〉，《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頁210。

考。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為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援，轉相依附。

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為水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¹¹⁷

若果我們將朱子所主張結黨之說與〈《伊雒淵源錄》提要〉兩相對照，不難發覺提要所言與清高宗反對朋黨之論如出一轍。提要中所謂攀援、水火之爭，及至無所不至，其實是間接攻擊朱子結黨之說。〈子部·儒家類一小序〉再進一步指出宋學家結黨之弊，乃至禍延宗廟：

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¹¹⁸

要泯滅門戶之見以及杜絕黨爭，便要找出其成因，才可防微杜漸。就四庫館臣所論，門戶之見是源於經學解釋權的開放，於是經學家在好勝前人時賢、好議論、求名爭利、自命清流、互相標榜、聚眾講學、維護師說，以及由言官制度漏洞等因素促成下，形成了門戶之爭。合而論之，這些因素不外乎由於爭逐名利，進而互相結盟、標榜，最後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體，出現門戶之爭的現象。

四庫館臣認為儒者和孔、孟正傳須具有的條件在於：「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又說：「儒者無植黨、無近名、無大言而不慙、無空談而鮮用，則庶幾孔、孟之正傳矣」，¹¹⁹既然宋儒不符合這些條件，當然稱不上是真儒，亦非得孔、孟正傳，則宋儒自詡繼承孔、孟道統之論亦因此成疑，其學術權威亦因此而動搖。以下就各部提要有關形成門戶之見的因素歸納如下：

就好勝前人時賢方面，〈《春秋左氏傳續說》提要〉說宋儒有「好軋先儒之習。」¹²⁰〈經部·詩類一小序〉和〈《汝堂文集》提要〉分別指出宋儒務勝漢儒因而引起門戶相爭：

117 〈《伊雒淵源錄》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頁519。

118 (清)紀昀，〈子部·儒家類一小序〉，《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頁769。

119 同上註。

120 〈《春秋左氏傳續說》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頁221。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眾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¹²¹

蓋漢學但有傳經之支派，各守師說而已。宋學既爭門戶，則不得不百計以求勝，亦勢之不得不然者歟？¹²²

宋儒除了要勝漢儒之外，對於時賢亦不相讓，因為相爭而形成門戶之見。〈《御纂周易折中》提要〉：

自宋以來惟說《易》者至夥，亦惟說《易》者多岐，門戶交爭，務求相勝，遂至各倚於一偏。¹²³

〈《四書惜陰錄》提要〉亦道出即使同是宋學，也有門戶相爭的情況，指出朱、陸兩派便是為爭勝而形成門戶之見：

然講學以明道，非以求勝。但為朱、陸而爭，已不免門戶之見。¹²⁴

及至明代，情況可以說是變本加厲，已從「務求相勝」發展至「揚己凌人，互相排軋」的地步。〈《儒林宗派》提要〉：

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¹²⁵

好議論是另一個引起門戶相爭的因素。〈《史部總敘》〉提出由於議論的觀點不同，於是有門戶之見出現，進而發展為朋黨：

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¹²⁶

〈《明儒學案》提要〉又說：

夫二家之學（案：指朱、陸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黨立，恩讎轆轤，毀譽糾紛，正嘉以還，賢者不免。¹²⁷

121（清）紀昀，〈經部·詩類一小序〉，《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頁119。

122 〈《攷堂文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三，頁1657。

123 〈《御纂周易折中》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六，頁34-35。

124 〈《四書惜陰錄》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頁314。

125 〈《儒林宗派》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頁528。

126（清）紀昀，〈《史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頁397。

127 〈《明儒學案》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頁527。

〈《自警編》提要〉特別指出門戶之見是在南宋以後才形成，而南宋亦是理學形成的重要時期，由此說明理學與門戶之見的關係是相當密切：

亦以宋時士大夫風俗淳厚，惟汴都為極盛。南渡而還，門戶立而黨局生，議論繁而實意減，非復先民篤厚之風。¹²⁸

君子爭名、小人爭利，也是構成門戶傾軋之一因。〈《朱子晚年全論》提要〉的案語說：

韓愈〈送王秀才序〉，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子貢之敏悟，曾子之篤實，皆得聞一貫之旨，而當時未嘗相非。後之儒者，各明一義，理亦如斯，惟其私見不除，人人欲希孔庭之俎豆，於是始於爭名，終於分黨，遂尋仇報復而不已。實非聖賢立教之本旨。¹²⁹

又由於爭逐日盛，爭者爲了加強實力，於是競效攀援，從而促成朋黨，〈《慶元黨禁》提要〉：

宋代忠邪雜進，黨禍相仍，國論喧呶，已一見於元祐之籍。迨南渡後，和議已成，外憂暫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處堂。諸儒不鑒前車，又尋覆轍，求名既急，持論彌高，聲氣交通，賢姦混糅。浮薄詭激之徒，相率攀援，釀成門戶，遂使小人乘其暇隙，又興黨獄以中之。¹³⁰

此外，自命清流，互相標榜以及聚眾講學亦促成門戶之爭。〈《集部總敘》〉便道出宋學家因講學而論時政，與政治拉上關係，最後形成門戶之見：

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¹³¹

四庫館臣對於明代因講學而形成門戶之見特別留心，在以下提要內一再申明講學與門戶之見的關係密切，這是針對宋學的陸、王學派而論。〈《雜閩源流錄》提要〉：

自明以來，講學者釀為朋黨，百計相傾。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

128 〈《自警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頁1061。

129 〈《朱子晚年全論》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八，頁830。

130 〈《慶元黨禁》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頁521。

131 (清)紀昀，〈《集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頁1267。

程敏政作《道一編》，欲援朱子以附陸氏，論者譏其舞文。張烈作《王學質疑》，熊賜履作《閑道錄》，又詆斥陸、王，幾不使居於人類，論者亦譏其好勝。雖各以衛道為名，而本意所在，天下得而窺之也。¹³²

〈《西湖八社詩帖》提要〉：

明之季年，講學者聚徒，朋黨分而門戶立，吟詩者結社，聲氣盛而文章衰。當其中葉，兆已先見矣。¹³³

〈《小心齋劄記》提要〉：

（顧）憲成里居，與弟允成修宋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聲氣既廣，標榜日增。於是依草附木之徒，爭相趨赴，均自目為清流。門戶角爭，遞相勝敗，黨禍因之而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雖憲成等主持清議，本無貽禍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則黨類眾而流品混。既已講學，則議論多而是非生。其始不過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極，遂禍延宗社。¹³⁴

由以上的提要可知，門戶之見始於好名好利，然後傾軋浸厲，乃至禍延祖祧。這些說法與清高宗在乾隆五年（1740）所說：「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¹³⁵ 以及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所說，「自宋儒出，於是有道學之稱，然其時尊德性、道問學已譏其分塗。而標榜名目，隨聲附和者，遂藉以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之說是一脈相承。¹³⁶

此外，理學家為了維護本身學術宗派而形成門戶之爭的記述，於《四庫全書總目》之內在在皆是。以宋儒為例，有以下各則。〈《易傳》提要〉：

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本旨矣。¹³⁷

132 〈《雒閩源流錄》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三，頁567-568。

133 〈《西湖八社詩帖》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頁1751。

134 〈《小心齋劄記》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頁816。

135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日，頁876a-b。

136 《清高宗實錄》，卷四六一，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日，頁989a。

137 〈《易傳》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頁6。

〈《朱子晚年全論》提要〉：

朱、陸之徒，自宋代即如水火。厥後各尊所聞，轉相詬厲。於是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引朱以合陸。至萬曆中，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又尊朱以攻陸。¹³⁸

〈子部·儒家類案語〉：

至宋而門戶大判，讎隙相尋。學者各尊所聞，格鬥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載。中間遞興遞滅，不知凡幾。¹³⁹

四庫館臣亦認為明儒繼承了宋儒這個傳統，於是門戶之見仍然存在。此論於提要中亦不勝臚舉，如〈《元儒考略》提要〉：

然宋儒好附門牆，於淵源最悉；明儒喜爭同異，於宋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¹⁴⁰

又，〈《明儒講學考》提要〉：

明代儒者，洪、永以來多守宋儒矩矱。自陳獻章、王守仁、湛若水各立宗旨，分門別戶。其後愈傳愈遠，益失其真，入主出奴，互興毀譽。¹⁴¹

又，〈《東莞學案》提要〉：

案：明以來，朱、陸之徒互相詬厲。名則託於衛道，實則主於尋讎。…蓋門戶之爭，非一朝一夕之故矣。¹⁴²

由是觀之，宋學門戶之爭，歷宋、明兩朝而不衰，究其本源，實是宋學家爭名逐利所致。四庫館臣藉追溯門戶與黨爭的成因，以揭示宋學家在文章內倡言存天理、去人欲，但行為上卻又好名好利，從而動搖宋學的權威。

另一方面，政府監察架構在運作上的漏洞又是另一個形成門戶之爭的根源。

〈《蔡忠惠集》提要〉：

今考其時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亦上書請與同貶，歐陽修又移書責司諫高若訥，均坐譴貶謫，（蔡）襄時為秘閣校勘，因作是詩，至刊刻模印，為遼使所鬻。夫一人去國，眾人譁然而爭之，章疏交

¹³⁸ 〈《朱子晚年全論》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八，頁830。

¹³⁹ （清）紀昀，〈子部·儒家類四案語〉，《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四，頁799。

¹⁴⁰ 〈《元儒考略》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頁525。

¹⁴¹ 〈《明儒講學考》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八，頁834。

¹⁴² 〈《東莞學案》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八，頁833。

於上，諷刺作於下，此其意雖出於公，而其跡已近於黨，北宋門戶之禍，實從此胚胎。¹⁴³

〈《欽定明臣奏議》提要〉：

考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論所趨，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心，一劄動至千萬言，有如策論之體；小人舍公事而爭私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為訐訟之詞。迨其末流，彌增詭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臺諫闕於朝，道學譁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閣臣奄豎為之奧援。人知閣臣奄豎之日誣，不知其所以誣者由門戶朋黨為之煽搆。¹⁴⁴

上述兩則提要說明了個人的主觀好惡，每每使當事人因為感情用事，以致因私忘公，甚至為此而結黨訐訟，就是專司監察的言官猶不免乎此，由是從另一個角度贊成清高宗在乾隆十四年（1749）所提出「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以及乾隆二十年（1755）「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為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為揣摩，群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的說法，¹⁴⁵ 則可以明白何以錢穆說：「滿清以異族入主，最惡朋黨公論，橫摧深鋤，必使人盡孤立，不敢出聲發一言，而後彼乃得以聖天子萬世一姓，偃然踞我上。」¹⁴⁶

據四庫館臣的說法，門戶之見的禍害，輕則導致記載失實，重則甚至冊籍亡佚、學說湮沒。〈《論語義疏》提要〉指出該書的散佚是由於門戶之見引起：

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眾，剷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¹⁴⁷

事實上，南朝皇侃《論語義疏》對於研究《論語》有重大的價值。孫欽善〈《論

143 〈《蔡忠惠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頁1312-1313。

144 〈《欽定明臣奏議》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五，頁502-503。

145 《清高宗實錄》，卷三五四，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頁896a；《清高宗實錄》，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日，頁92a。

146 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頁587。

147 〈《論語義疏》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頁290。

語》說略》說它吸收了「江熙《集解論語》中十三家的成果，以及其他通儒的解釋而且一一標示姓名」，從而可見各家之說的異同。又說：「就注釋而言，皇疏內容豐富，援據詳博，很有參考價值。至於底本文字，無論本文還是注文，都與後來通行的邢疏本有較大差異，反映了不同的版本依據，故皇疏的版本價值也很高」，¹⁴⁸由此可知門戶之見對學術的禍害之大。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另又指出門戶之見會引致學術的傳承出現斷層：

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翬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井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¹⁴⁹

《〈古經解鈎沈〉提要》再加以申明此說法：

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掇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距之外。¹⁵⁰

《〈餘師錄〉提要》指出門戶之見形成主觀的評價：

宋人論文，多區分門戶，務為溢美溢惡之辭。¹⁵¹

《〈聖門釋非錄〉提要》：

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端，誠所不免。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¹⁵²

此流弊迄明仍然存在。《〈元明事類鈔〉提要》：

至明代說部，浩如煙海，所採亦未為詳賅。然萬曆以後，門戶交爭，恩怨糾纏，餘波及於翰墨。凡所記錄，多不足憑。¹⁵³

另外，四庫館臣將門戶之見與朝代覆亡扯上關係，不無政治因素。清高宗甚為鄙惡門戶之爭，已詳於前說，而館臣撰寫提要時揣摩聖意，以投人君之所好，亦屬情理中事，如《〈慶元黨禁〉提要》指出東漢、北宋、南宋與明的覆亡皆與門戶黨爭的關係密切：

148 孫欽善，《〈論語〉說略》，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十三經說略、二十五史說略》，頁227。

149 (清)紀昀，《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18。

150 《〈古經解鈎沈〉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三，頁280。

151 《〈餘師錄〉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頁1787。

152 《〈聖門釋非錄〉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頁316。

153 《〈元明事類鈔〉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頁1063。

總之，儒者明體達用，當務潛修，致遠通方，當求實濟，徒博衛道之名，聚徒講學，未有不水火交爭，流毒及於宗社者。東漢不鑒戰國之橫議，南北部分而東漢亡；北宋不鑒東漢之黨錮，洛、蜀黨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鑒元祐之敗，道學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鑒慶元之失，東林勢盛而明又亡。皆務彼虛名，受其實禍。決裂潰覆之後，執門戶之見者猶從而巧為之詞，非公論也。張端義《貴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黨。伊川見道之明，不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偽學。深思由來，皆非國家之福。」斯言諒矣！¹⁵⁴

又，四庫館臣亦將門戶之見說成是明亡的主因。這種解釋明亡的說法，與官方的說法互相呼應，旨在淡化臣民以為清得天下自明的看法。例如《崇禎閣臣行略》提要便直接指出「明以門戶亡國」。¹⁵⁵《小心齋劄記》提要亦說：「門戶角爭，遞相勝敗，黨禍因之而大起。恩怨糾結，輾轉報復，明遂以亡。」¹⁵⁶

此外，四庫館臣對於門戶之見促成明亡的經過亦有細緻的描述與分析。在《王學質疑》提要說出門戶之見始於東林講學，而東林正正是王陽明學派的一脈：

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講學則始於東林。¹⁵⁷

《東林列傳》提要對於上述說法作更具體的說明以及分析：

明萬曆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聲氣蔓延，趨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門戶，流品亦遂糅雜。迨魏忠賢亂政之初，諸人力與撐拄，未始非謀國之忠。而同類之中，賢姦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於是黨禍大興，一時誅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至崇禎初，權閹既殛，公論始明，而餘孽尚存。競思翻案，議論益糾紛不定。其間姦黠之徒，見東林復盛，競假借以張其鋒。水火交爭，彼此報復。君子博虛名以釀實禍，小人託公論以快私

154 《慶元黨禁》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頁521。

155 《崇禎閣臣行略》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二，頁563。

156 《小心齋劄記》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頁816。

157 《王學質疑》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七，頁827。

讎。卒至國是日非，迄明亡而後已。¹⁵⁸

四庫館臣如此強調門戶黨同伐異的問題，乃至於提要中多番闡述門戶之爭，禍及國祚，實乃響應清高宗反門戶以及否定宋儒聚眾結黨之論，同時又將亡國罪責歸因於宋學，以說明學術如何誤國。從另一角度而言，四庫館臣雖然明白門戶之見與政治密不可分，在提要內亦表現出亟欲超越門戶之見的窠臼，但其打擊門戶的舉措又何嘗不是政治主導下的產物？又何嘗不是落入另一個門戶的窠臼？

七、超然於漢、宋學之上的經學評騭準則

誠然，評騭學術優劣是不可能沒有標準與立場，一涉及品評優劣，便會使品評者與被品評者之間的關係出現緊張，甚至互相攻訐以保自身學術立場，因而出現門戶之爭的結果。四庫館臣在〈經部總敘〉中明確提出要「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衆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¹⁵⁹然而，《四庫全書總目》又對於宋學作出不少深刻而尖銳的批評，其批評的程度甚至使人產生「重漢輕宋」的印象。¹⁶⁰例如〈《詩補傳》提要〉說：

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說詩。其間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末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肯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¹⁶¹

〈《詩疑》提要〉花了不少篇幅說明宋儒王柏如何改動《詩經》的內容，說「此書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¹⁶²

158 〈《東林列傳》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頁527；〈《涇皋藏稿》提要〉亦說：「明末，東林聲氣傾動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擊，置君國而爭門戶，馴至於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而未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二，頁1513；〈《劉戴山集》提要〉也說：「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圮東林一派始以務為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子，雜糅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勢猶未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二，頁1514。

159 (清)紀昀，〈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

160 詳請參閱本文「引言」所舉列諸家之論。

161 〈《詩補傳》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頁122。

162 〈《詩疑》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頁138。

〈史部總敘〉則說明宋儒「舍傳以求經」是不可行，說其可行只是自欺欺人：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為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¹⁶³

〈《太極圖分解》提要〉的案語，更直指宋儒因性而言理，與人事得失無關，說：案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衍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極兼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¹⁶⁴

另一方面，《四庫全書總目·凡例》開宗明義提出「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以及「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教茲實學」的原則。¹⁶⁵ 又說「是書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為多。」¹⁶⁶ 要考訂異同，別白得失，非藉文字訓詁、史地考證之資不能成其事，漢學由是成為品評學術優劣的標準。¹⁶⁷ 故此，宋學在這些標準下

163 (清)紀昀，〈史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頁397。

164 〈《太極圖分解》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頁801。

165 (清)紀昀，〈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18。

166 (清)紀昀，〈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頁19。

167 從另一角度而言，即是以「言之有據」為標準，這種學風的出現與發展，請參閱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以及羅炳綿老師，〈清代考證學淵源和發展之社會史的觀察〉，頁75-93等著述。

被受批評亦是在情理之中。

再者，四庫館臣通過比較而得出漢學較宋學優勝。他們認為宋學多尚虛談，但在制度方技等專業範疇，尚虛談者實無置喙的空間。〈《數學九章》提要〉說：

宋代諸儒，尚虛談而薄實用，數雖聖門六藝之一，亦鄙之不言。即有談數學者，亦不過推衍河、洛之奇偶，於人事無關。故「樂」屢爭而不決，「曆」亦每變而愈舛。豈非算術不明，惟憑臆斷之故歟？¹⁶⁸

於此，漢學尚實之說實勝宋學一疇，此乃學派的客觀條件使然，亦是四庫館臣從本身主觀條件出發的結論。¹⁶⁹〈《禮記意評》提要〉說：

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而亦未敢盡略其制。蓋名物度數，不可以空談測也。¹⁷⁰

〈《讀禮志疑》提要〉亦說：

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¹⁷¹

另一方面，宋儒因為疑經而產生不少流弊。例如〈《周禮述注》提要〉說宋儒好議論以致混淆經義：

宋儒喜談三代，故講《周禮》者恆多。又鑑於熙寧之新法，故恆牽引宋代弊政，支離詰駁，於注疏多所攻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淆。¹⁷²

除了疑經之外，宋儒甚至改經。相反，漢儒因為重家法，即使經典在流播過程中出現異同，也可從其傳承脈絡而找出本源。〈《詩疑》提要〉：

（王）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為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¹⁷³

168 〈《數學九章》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零七，頁905；〈《讀書叢說》提要〉亦說「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虛談」，《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頁97。

169 正如杜維明所說，清代的通儒不僅是經學家、歷史學家，而且往往還精通一門或幾門理論或實用科學，見杜氏著，〈早期清代思想中「學」的觀念〉，頁119-142。故此多尚虛談的宋學自然不合當時通儒的口味。

170 〈《禮記意評》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四，195。

171 〈《讀禮志疑》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二，頁177。

172 〈《周禮述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頁155。

173 〈《詩疑》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頁138。

此外，四庫館臣從時代先後論漢、宋學的傳承關係，指出若無漢學的基礎，則無宋學的成就，兩者在學理上有著血脈相通的關係。〈《四書參註》提要〉說：

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排擊義氏、詆譏隸首哉？¹⁷⁴

在〈《三禮圖》提要〉說：「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器，猶有存者。」¹⁷⁵道出因為漢時去古未遠，漢學家之說有其可信性。

另一方面，四庫館臣對於宋學的長處亦未有忽略，〈經部總敘〉說：

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宋學具有精微……¹⁷⁶

舉凡學派，必有短長。在四庫館臣眼中，漢學之弊乃是瑕不掩瑜，而宋學之失可謂功不補患。他們之所以取漢而捨宋，其實是兩害取其輕的做法。基於以上認識，四庫館臣提出以漢學為尊的結論，亦是順理成章。〈經部·詩類一小序〉提出：

今參稽眾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採，並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¹⁷⁷

並且在〈《九經古義》提要〉提出通經達道的門徑在於由小學入手之論：

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摛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

174 〈《四書參註》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頁318。

175 〈《三禮圖》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二，頁176。

176 (清)紀昀，〈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

177 (清)紀昀，〈經部·詩類一小序〉，《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頁119。

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¹⁷⁸

然而，四庫館臣亦非完全唯漢是尊，對於漢學之弊亦有所措意。〈經部總敘〉便指出漢學之弊在於「拘」，說：

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¹⁷⁹

又以「瑣」去形容清初漢學的流弊，說：「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¹⁸⁰

此外，〈《左傳補注》提要〉更以惠棟偏重漢學的研究方法為例說明它的毛病，說：「國朝惠棟撰。……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¹⁸¹〈《孝經問》提要〉再重申漢儒之失在於拘泥師說，但同時又指出宋儒以理斷經和改經，亦會產生橫決而不可制的流弊：

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尚書》、刪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來者漸矣。¹⁸²

由是觀之，四庫館臣是站於經學發展的頂點去評騭前人經學得失，指出漢學和宋學各有優劣之處，然後再從實用角度提出兼采互用的主張。〈經部總敘〉說：

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¹⁸³

〈《大學章句》提要〉亦說：

178 〈《九經古義》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三，頁277。

179 (清)紀昀，〈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

180 同上註。

181 〈《左傳補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頁242。

182 〈《孝經問》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頁266；早在南宋朱熹時代，朱子已批評這種以己意曲解經典的流弊，說：「今人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二零九，頁2693。

183 (清)紀昀，〈經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頁1。

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¹⁸⁴

總而言之，四庫館臣雖然以漢學為尊，但亦非盲目崇漢，就其屢及泯滅門戶之見，謂其調和漢宋，固然；就其攻擊宋學之提要觀之，謂其重漢輕宋，亦然；就其言漢、宋互有長短，謂其超然於漢、宋學之上，亦然。故由不同的角度觀察，便會得出不同的印象，其學術立場亦不無橫嶺側峰之感。

八、結 論

通過考察《四庫全書總目》對於門戶之見和漢、宋學的評騭，可以知道「重漢輕宋」或者「漢宋調和」均不足以概括四庫館臣和清高宗在經學方面的共識。

清高宗通過文字獄及其他行政手段以掌握經學解釋權，藉漢學以篩汰宋學不利統治的成份，又藉編纂《四庫全書》以進一步促進漢學和宋學的互相競爭和補足。故此，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說：

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經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亦轉精博矣。¹⁸⁵

經學與政治兩股流向雖然藉編纂《四庫全書》而匯流，但是正如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所指出，當中仍是以政治流向為主導：「清廷雖尊朱，然聚徒講學，朋黨清議，皆所厲禁，則尊者其名，排者其實。館臣據旨立論，屢言門戶水火，朋黨亡國，其意欲使人盡孤立，以蟻附於一義，他非所計也」，¹⁸⁶在政治主導之下，四庫館臣通過四庫館的運作，對於前代經學論述以實事求是的漢學標準加以評騭，以還原經典面貌，宋儒倡言君臣共治天下之說由是江河日下。

另一方面，四庫館臣雖然以漢學為尊，但事實上卻是融合漢學與政治而自成門戶，別樹一幟。而此一門戶實為有意識地超然於漢、宋之爭的層次之上，藉以作為統治者整合政治與學術的工具。誠如周中孚所論：「竊謂自漢以後，簿錄之

184 《大學章句》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頁294。

185 (清)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儒林集傳錄存》，收周駿富輯，《清代傳記資料叢刊》，頁2。

186 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頁581。

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矣。」¹⁸⁷ 中山久四郎〈清代的經學史〉也說：「乾隆時代以漢學為主，雖不免有漢學之尊的偏執；但是對於馬融、鄭玄等漢學的是是非非也能公平的解說。」¹⁸⁸ 是以，對於漢、宋之學，既有批評，亦有褒揚。言其「重漢輕宋」，或「漢宋調和」，皆不足以概括其實。

然而，學術批評必須有立場，一旦有立場便會在批評與被批評者之間形成門戶之見，四庫館臣早已意識到這點，故此在〈凡例〉當中一再宣示要摒除門戶之見，但這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故此《四庫全書總目》編纂的原意本在於摒除門戶之爭，但卻以漢學的門戶攻伐宋學。簡而言之，這個吊詭的現象猶如抱薪救火，乃至漢、宋之爭愈演愈烈，迨清季而猶未止息。

187 (清)周中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頁11，總頁數369b。又，洪業也贊同周氏此論，曾說：「就《總目》之大體言之，此評可稱的論。」見〈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序〉，頁54。

188 中山久四郎，〈清代的經學史〉，載安井小太郎等著；連清吉、林慶彰合譯，《經學史》，第四編，頁21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 朱熹，《朱子文集》，陳俊文校編，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 (宋) 程頤，《二程文集·伊川文集（二）》，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5冊，1986。
- (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方燦如，《集虛齋學古文》，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3冊，1996。
- (清)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清)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430冊，1995。
- (清)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香港：三聯書店，錢鍾書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1998。
- (清)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香港：三聯書店，錢鍾書主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1998。
- (清) 阮元，《儒林集傳錄存》，臺北：明文書局，周駿富輯，《清代傳記資料叢刊》，1985。
- (清)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924冊，1995。
- (清)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文集》，包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 (清)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外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包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輯》，1974。
- (清) 姚鼐，《惜抱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453冊，1995。
- (清)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 紀昀，《灤陽消夏錄》，張致中點校，《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 (清) 清聖祖，《清聖祖御製詩文二集》，故宮博物院編，海口市：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2000。
- (清)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文二集》，故宮博物院編，海口市：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2000。

-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史城編，《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清)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7、338冊，1986。
- (清)程晉芳，《勉行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433冊，1995。
- (清)黃永年，《南莊類稿》，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0冊，1996。
-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5冊，1986。
- (清)戴震，《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戴震，《戴震全書》，張岱年編，合肥：黃山書社，1994。
- 《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第1輯、第2輯、第6輯)，臺北：華文書局，1969。

二、近代論著

- 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收於氏著，錢婉約譯，《中國史通論》(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王汎森，〈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收於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26。
- 王家儉，〈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收於氏著《清史研究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61-85。
- 王達敏，〈從尊宋到崇漢——論姚鼐建立桐城派時清廷學術宗尚的潛移〉，《中國文化》，19、20期合刊，2002年，頁279-293。
- 王達敏，〈論姚鼐與四庫館內漢宋之爭〉，《北京大學學報》，43卷5期，2006年9月，頁86-94。
- 王鍾翰，〈清代前期的黨爭〉，《歷史月刊》，70期，1987年5月，頁62-67。
-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 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成都：巴蜀書社，1988。

- 安井小太郎等著，連清吉、林慶彰合譯，《經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
- 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40-161。
- 牟潤孫，〈論弘曆的理學統治與錢大昕〉，《海遺雜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頁197-206。
-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 何佑森，〈清代漢宋之爭平議〉，《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27期，1978，頁97-113。
-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405-486。
-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成都：巴蜀書社，1991。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 吳哲夫，〈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故宮學術季刊》，9卷3期，1992春季，頁1-18。
- 杜維明，〈早期清代思想中「學」的觀念〉，收於氏著《道、學、政：論儒家知識份子》，上海：上海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頁119-142。
- 周予同，〈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收於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694-701。
-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頁55-79。
- 周積明，〈「四庫學」通論〉，《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265-293。
-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乾嘉「新義理學」〉，林慶彰、張壽安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頁1-39。

- 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4期，2004年11月，頁1-18。
- 周積明，〈理學的二重性與乾隆帝對待理學的心態〉，《杭州大學學報》，24卷1期，1994年3月，頁73-81。
- 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 侯美珍，〈「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書目季刊》33卷2期，1999年，頁77-129。
- 洪業，〈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序〉，《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51-55。
-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載《故宮學術季刊》，23卷2期，2005冬季，頁83-128。
- 夏長樸，〈乾隆皇帝與漢宋之學〉，載彭林編，《清代經學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56-192。
- 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大陸雜誌》，54卷4期，1977年，頁151-172。
- 張晶萍，〈乾嘉學術與「漢學」觀念〉，《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0卷1期，2001年1月，頁70-76。
-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8。
- 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頁253-276。
- 張麗珠，〈「漢宋之爭」難以調和的根本歧見〉，林慶彰、張壽安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頁235-280。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
-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 陳東輝，〈二十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25卷2期，2006年，頁29-38。
- 陳祖武，〈從經筵講論看乾隆時期的朱子學〉，《國學研究》，9卷，2002年，頁295-313。
-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馮明珠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217-229。
- 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分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蔣秋華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頁141-170。

-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6。
-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型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收於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87-124。
- 黃順益，《惠棟、戴震與乾嘉學術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8。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 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中國文化研究》，23期，1999年春季，頁85-91。
- 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出版年份不詳。
- 楊晉龍，〈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6期，2000年3月，頁523-586。
- 楊韶蓉、李劍波編，《經史說略——十三經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 葉高樹，《清代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 葉高樹，〈乾隆皇帝「稽古右文」的圖書編纂事業〉，《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冬季，頁59-105。
- 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249-282。
- 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漢學研究通訊》2卷3期，1983年，頁146-151。
-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雜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劉漢屏，〈略論《四庫提要》與四庫分纂稿的異同和清代漢宋學之爭〉，《歷史教學》，7期，1979年，頁40-44。
- 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723-743。
- 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0，頁364-388。
-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
- 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581-588。

- 錢穆，〈漢學與宋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571-579。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 薛新力，〈清代漢學思潮對《四庫全書總目》之影響〉，《圖書館論壇》，22卷4期，2002年8月，頁118、120-121。
- 羅炳綿，〈清代考證學淵源和發展之社會史的觀察〉，《新亞學術集刊》，第2期，1979年，頁75-93。
- 羅炳綿，〈四庫全書編集重心的轉變〉，《新亞生活月刊》，7卷6期，1980年2月，頁1133-1136。
- 羅炳綿，〈紀昀的學術思想與四庫提要的立場〉，《新亞生活月刊》，8卷8期，1981年4月，頁1341-1345。
- 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Schelling, Thomas C..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Standards of Evaluation of *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Ssu-K'u Ch'üan-shu* were Formula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Classical Learning

Hsü Ch'ung-te

Abstract

The anti-Sung school reviews of *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Ssu-K'u Ch'üan-shu* impressed its readers. The Ch'ien-lung emperor, motivated by political concerns, exploited *k'ao-cheng* scholars to attack the Sung learning scholars' factionalism and sectarian politics. Meanwhile, the *k'ao-cheng* scholars, with academic concerns, wanted to restore the ancient classics by eliminating the contents added and modified by the Sung learning school. Thu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su-k'u ch'üan-shu* in 1772 provided a chance for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two streams.

The Ssu-k'u editors,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mperor's will, therefore attacked the Sung learning scholars' sectarian politics. In return, the emperor allowed the editors to adopt Han learning standards to assess the academic value of each monograph and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lements of Sung learning. As a result, a new sectarian position reflecting the converge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streams was established. (Edi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Ssu-k'u ch'üan-shu tsung-mu; Jing-pu, reconciling Han and Song learning, respecting Han and rejecting Song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 standards for evaluating scholarship on the classics